



文论天地

抗震诗歌的诗学启示

蒋登科

“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已经过去了一年了,但它留给人们的创伤和思考是长久的,如何从这种创伤中走出来,思考更多的有关救助、文化的问题,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地震带给人们不只是灾难,从人文精神层面看,人们对灾难的救助、反思,对生命的关怀,也是地震之后从行动和文学中体现出来的具有价值的收获。地震后出现的大量诗歌,使缺乏生气的新诗重新找到了位置和力量,作品之多、影响之广,是近些年来少有的。题为《孩子请抓紧妈妈的手》的诗在地震后第二天就开始在网上广泛流传,其口语化的语言、优美凝重的旋律和温暖的人文关怀打动了无数读者。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各地出现的作品非常多,出版的诗集、诗选达到了数十部。一些诗人还身体力行,参与救灾工作。这些作品不一定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但它们来自诗人的体验,来自第一现实,所具有的真实感是毋庸置疑的。

地震诗歌使我们触碰到诗人的良知,感知到新诗的风向。许多诗人把自己置身于受难者的场景中,体验生命的艰难与坚强,体会和理解灾难中的人们的心情,最终诗情泉涌,形成一个创作的峰值。地震诗歌及其引发的诗学现象是值得认真思考和总结的。

其一,真诚比技巧更重要,作者范围非常广泛。从知名诗人到普通的诗歌、文学爱好者,很多人都有作品面世。有些多年不写诗的作家提起了诗笔,有些根本没有写诗经历的人也写出了诗稿。在地震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许多网站上、博客里,我们都能随便找到具有可读性、使人感动的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平常被人称为“先锋诗人”的诗人也写出了不少作品,比如徐敬亚、王小妮、杨

黎、雨田、沈浩波等,这使人想起卞之琳由《鱼目集》向《慰劳信集》的转变,何其芳从《画梦录》向《夜歌》的转变。在很短的时间里,许多报刊社、出版社都推出了抗震诗歌的专版、专刊、选集,新诗因此而又一次“火”了一把。由此我想,写诗并不是诗人的专利,如果说有些诗人存在着为写诗而写诗的情况,而在灾难中的普通人写诗,虽然在艺术上不一定新颖,不一定具有多少创造性,但一定是发自肺腑的。这一现象提醒我们,诗并不是高深莫测的,它无处不在,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就能够发现诗的因子,只要通过自己写出了更多人的体验和感受,诗就会拥有读者。为了写诗而写诗,为了诗外目的而写诗,为了文字游戏般的所谓的新颖、创造而张扬所谓的探索,对于诗歌本身,好像都是附加的要求。

其二,为诗歌发展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方向。这虽然不是过去所说的“大一统”,不需要外力支撑。但靠自发集结的诗歌阵容,在当下诗坛还是值得欣慰的。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诗歌的“统一战线”,这条“战线”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是说好诗就只有循着这条路子前进,而是说,这条道路是可能出现好诗的,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振兴一下诗坛。这个路子也许可以成为今后诗歌多元化发展的一个平台,延续中国文化的血脉,包括仁爱精神,关爱情怀,互助精神,悲悯意识等,这些恰好是近些年来诗歌探索难以获得进展的“瓶颈”。

其三,地震诗歌有着积极的价值取向。一是关注生命,无论是思考灾难,悼念受难者,还是关注受灾者,反思我们自身,不少作品都体现出温暖的生命关怀,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也抒写了生命的尊严;二是关注现实,不管是针对灾难中的具体事件、

人物,还是对灾难进行整体观照,许多作品都体现出浓郁的现实意识,而且,与过去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同的是,普通的人、普通的事受到了格外的青睐,而不是只关注那些大人物,这就使作品更接近现实,接近普通人,也就比较容易走进普通人的心灵,走进我们的日常精神世界;三是充满爱心、关怀,充满温暖的人性光辉,与过去见到的那些冷冰冰、血淋淋的作品形成明显的差异。如果说过去的一些作品是把生命的压抑、苦难切割成一块块的,以警醒麻木的生命,那么,地震后出现的许多作品则是把受难的心灵、生命复合为一个个鲜活的整体,使“人”的形象更加明显、突出;四是表达上接近读者。许多作品都采用了日常口语,但非常注意诗的文体特征,采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尤其是采取了“你”“我”对话的方式,仿佛与读者谈心、交流,非常切近心理医学上的心理疗法,因而比较容易为人接受。许多作品注重音乐性,适合对不可捉摸的精神的抒写,也适合阅读和朗诵。

其四,回归与再出发。地震诗歌在很多方面都是对过去新诗艺术经验的一次有效回归,使那些被我们曾经放弃、批评甚至唾弃的艺术元素、艺术手段、艺术精神集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价值,是对新诗艺术探索的一次全面反思,那些点点滴滴的艺术经验在新的现实面前,集中体现出自身独特的诗学意义。比如关注现实、关怀民生、思考生命等。基于此,这也可能是新诗艺术探索重新出发、重新获得生机的契机,只要我们的诗人认真思考与总结,他们定能从中发现新的力量与方向。

当然,因为题材、情感内涵、表达

方式等方面存在雷同,并不是所有的地震诗歌都堪称佳作,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当下社会是一个多元发展的社会,人们的生命体验、精神世界、人文观念、生命意识也是多元的,除非在遇到全民灾难这样的大事件面前,我们没有办法、也不可能用某种统一的观念去要求诗人按照某种方向展开探索。

其次,对于地震诗歌带给未来诗歌发展的影响,我们也不能寄予太高的期望,现代人具有明显的健忘特征,他们的生活压力太大,一个事件过去之后,人们很快会以新的方式获取他们的生活与生命方式。再者,如果我们只是从表面上去领会地震诗歌带给诗坛的启示,提倡诗歌只写那些温暖的感受,只以比较单一的艺术手段来表达,我们又会很快发现诗歌的单薄。

但不管怎样,地震诗歌提供的启示是值得进一步总结的。清代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一方面是说,诗人在遇到国家、民族的不幸的时候往往能够写出好诗,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诗歌应该是开闸的,应该关注丰富的社会与现实。只有将自我放置于广泛的社会现实,诗人的自我意识、自我发现才具有真正广泛的诗学意义。

因此,对于地震诗歌的艺术观念和手法,对于抗震中体现出来的精神,我们应该抓住精髓予以张扬,这种张扬是将其融合到现实生活之中,融合到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之中,融合到诗歌艺术的多元探索之中,而不能以此来规定诗歌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对于诗歌的发展,还是应该以多元的艺术探索去揭示生活的丰富性。

报载,近日一家省级电视台为一位“丑闻”女明星制作出上下集专题片,对其所谓“复出一周年”,大肆渲染。对此,国家广电总局再次发出声音——广播电视综艺、娱乐、访谈等各类节目,严格禁止谈论名人绯闻秘史、艺人隐私恋情等花边新闻、八卦新闻,凡再有播出此类节目的电台、电视台,一经发现,要从策划选题者开始,层层追究责任。我们为广电总局的这道禁令拍手叫好!

近年来,一些媒体对明星绯闻情有独钟,津津乐道,乐此不疲。诸如,谁谁同性恋啦,某某闹婚变啦,谁是谁的私生子啦,某女明星和某男导演有“潜规则”啦,甚至,谁与谁酒吧里卿卿我我啦,某与某轿车里男欢女笑啦等等污七八糟的东西充斥一些报纸版面和电视荧屏。这样的所谓娱乐新闻,让人疑惑:它们究竟在传播什么,倡导什么?那些媒体的责任感何在?

对明星绯闻的大肆炒作,在一些媒体上已成了一种歪风邪气,一种精神污染,它在潜移默化地侵蚀着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毒害世道人心和社会风尚,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此风不刹,必将危害社会和谐安宁。

某些“问题明星”和低俗节目的走俏,固然有其复杂因素,但明眼人一看,便不难发现答案——

首先,媒体有责任。在资讯迅猛发展的今天,随着报纸和视频频道的骤增,媒体间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特别是一些综艺、娱乐、访谈等节目,为了抢“卖点”,夺“眼球”,提高收视率,扩大发行量,就玩命地从明星身上挖新闻,挖不出新闻就挖绯闻。以此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拿着肉麻当有趣,捧着裹脚布当哈达,

将荒诞荒唐当美景。竞争是好事,无论是媒体之间,还是栏目之间,有竞争才有压力,有压力才有动力,有动力才有活力。然而,香臭不分,是非不辨,不讲格调、不负责任地炒作明星绯闻,当作竞争的手段,只能说

是市侩主义,是不可取的。须知,喜闻乐见,通俗易懂,并不是庸俗媚俗,哗众取宠。在娱乐节目中,对明星的访谈报道,不应牺牲节目的品位,更不该牺牲媒体的独立思考 and 应有的人文精神。报道明星,可以介绍他们的从艺历程、工作甘苦、敬业精神等,报道他们的情感历程、家庭生活、业余爱好、生活情趣,也未尝不可,但也应该摒弃低俗,引人向上。娱乐节目要娱乐开心,也要情趣健康,启智怡神。这样才能承担起媒体应有的引导风尚,教化人心,传颂真善美、挾伐假丑恶的社会责任。

其次,明星当自律。如今,有那么一些演艺人员和经纪公司,为了自己或旗下的艺员成“明星”,不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对艺术的苦苦追求上,而是在“歪门邪道”上下功夫。编造一些绯闻兜售,今天说个林间隐情,明天讲个床帏秘事,将赤裸裸的无耻谎言,脸不红心不跳地往外卖,明目张胆挑战社会道德底线。以绯闻丑闻出名,已仿佛成了当前演艺圈某些人的一大法宝。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不必讳言,时下演艺圈里的个别角落,快成了藏污纳垢的文化垃圾场。有些从业者生活趣味低俗,道德意识淡薄,做了违反国家法纪或不光彩的事,到头来却能风风光光地“复出”,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对于这种怪现象,光靠道义上的批评已不能匡正时弊,很有必要用行政手段加强监督管理。国家广电总局作为管理部门再次“亮剑”,正当其时,出手果断。

作为媒体,尤其娱乐报道的从业者,针对“国家广电总局再下禁播令”这一事件,当反思、警醒。媒体的职责决定了自己应该是现代文明进程的记录者,主流

文化的传播者,社会和谐的建设者。媒体传播的内容失去人文关怀,失去良知的时候,也正是媒体失去受众,失去社会公信的时候。长此以往,必然遭到大众的抵制、唾骂和



用艺术凝固感人瞬间

赵利平

执勤一线轮换下来的战士,竟然不觉间站着睡着了,路过的记者摄下了这一感人的画面。

真实感人的画面,令雕塑家许鸿飞心灵备受震撼,他认为这是一件值得讴歌并应格在人们心灵上的感人事件,而画面本身就是一件现实主义雕塑,一件能概括反映那画面背后一段段铁骨热血故事的标志物。于是,情怀激荡的许鸿飞有了创作的冲动,他深入采集画面背后的细节:联系记者搜集当时更充分更多角度的图片;实地考察火车站场地的状况;通过部队请来那九天九夜奋斗于火车站的4位士兵。参照原型勾画构图、堆积泥塑,塑成了这座打动心灵、震撼视角的纪念性铜雕。黄永玉为其命名为《九天九夜》。

与传统上表现军人形象的雕塑形式不同的是,《九天九夜》这座雕塑不再是昂首挺胸或持枪舞刀,不再有那么巍然

坚强的制服式的雨衣、衣帽、手套、军鞋,既交代了对象的身份也有着新时代军人的印记,又表述了当时寒冰冷雨的情景,神态自然的士兵令人感到亲切、感动而又不忍打扰。形象传神的塑造让人看到人性的秀美与壮丽,看到责任的谱写与坚守,看到士兵背后的整个部队乃至那九天九夜中为人民的生命与安全奋斗着的人们。

许鸿飞这座表现了和平年代中“平凡而伟大”的作品,在还原一段历史记忆的同时,又让人感受到了其中的精神实质,虽与许鸿飞以往惯常肥乎乎、水灵灵的“肥女”风格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进一步探究,却可发现作者依然践行了

一贯奉行“艺术题材来源生活”的信念。许鸿飞在“肥女”雕塑中常常借助“肥女人”表现真实、世俗而又鲜活诙谐的生活场景,他以脂肪的张力和视觉厚重的力量去锻造艺术性和表现生活状态。《九天九夜》同样也是生活场景与生活状态的记录,但这一场景及背后生活状态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也体现出许鸿飞作为艺术家对重大事件认知的正义感、责任感以及其多元的艺术表现技能。

“五一”前夕,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中,高达2.5米、宽2.9米的纪念性雕塑《九天九夜》在广州雕塑公园落成揭幕,那段岁月也将随之永远被定格、被记忆。

特,颇似一首寓言。主人公二喜面临生存困境,从他离家八年回家,又再次离家的故事里,在对亲情、爱情、友情的无奈中,表达出农村底层青年寻找精神家园和生存欲望的情态。

对人的关注和描写,不止于生活状态的真实再现,更需要对人性的开掘和细腻独特的表现。作为“刑警张玉兰系列”的《无法结局》从侦破刑警队长牛玉来是自杀还是他杀切入,创作者娴熟地运用套层结构,讲述了一个案件包裹着友情、爱情、荣誉、诱惑下人性搏斗的故事。侦破案件的过程即是对张、牛二人人性的严峻拷问,又是对能否坚守警察良知的考验。张玉

电视电影景色新

任殷

清醒的现实主义是中国左翼电影鲜明的创作特征,也成为中国电影最珍贵的优良传统。上述4部影片站在民族立场上,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它们以现代视角回眸历史,书写了中国近一个世纪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有力地显示出电视电影创作视域和境界的开阔,以及本土气息的文化格调。

其次,以平民情怀关注民生世态,深入底层甘苦,憧憬未来生活,构成电视电影深广、温暖的“三贴近”语境。

别开生面的《天使看得见》没有丝毫对残疾人的同情和怜悯,而是用鲜明的以人为本的现代观念描摹出盲人的真实生活和

精神状态。张问德带领腾冲民众抗日的真实事件为基础,再现了鲜为人知的滇西战役。影片围绕着张问德“国家有难,心如焚”的精神状态,运用电报、家信勾连情节的叙事手段,将沦陷后腾冲的惨状与张问德的沉重心情互为映照,突出渲染出张问德“复田岛书”时沉着应对和愤懑的情状,体现出张问德“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爱国情操。影片忠于历史,客观地描写了国民党预二师抗日保国的事迹,抒发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爱国情怀。



一切过往的岁月和岁月中的历史,往往要退到一定的距离,才能看得清楚。在南粤那场百年不遇的持续寒风雨雪中,那场始于2008年1月26日发生在广州的“非常春运”中,由于粤北风雪封路,广州火车站挤满了滞留的旅客。寒雨霏霏,冷风刺骨,为了那数十万进退维艰的旅客的安全,4名奋战39小时后刚刚从

第九届数字电影百合奖5月6日在京揭晓。纵观本届百合奖获奖的12部作品,清晰地看出电视电影创作在不断追求着思想深度与艺术品位的统一,主流价值与大众情趣的融合,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的交汇。具有开放、多元的态势和不断开拓的艺术空间。

首先,关注中国社会政治风云变幻,彰显时代精神,发现、选择与时代同步,切合社会发展的主旋律题材,始终是电视电影的创作主脉。正当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时刻,获奖的《十八个手印》、《青春制造》、《跨越殇魂》、《李天佑血战四平》等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书写了中国上

世纪的社会历史进程。根据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冒着生死危险实行“大包干”的真实事件创作的《十八个手印》,不再停留于惊心动魄的事件描述,而是以新来的县委书记深入小岗村为线索,构筑出有时代典型意义的思想观念、为官方立场、与农民的关系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内中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影片把当年凤阳农民生存的困境和对土地的渴望放在1978—1981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宏阔背景下,突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创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去反思中国曾经走过的道路,为影片灌注了历史的厚重与情感的震撼。

《青春制造》以“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宏军为原型,通过三个青年技术工人与德国技师间的故事,正面描写上世纪90年代初国有合资企业与国际接轨过程中,人们经历的阵痛与变化,故事虽简单,却传达出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足音。

《李天佑血战四平》保持了“共和国名将系列”的品质,无论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场面,还是名将人物的个性显现以及叙事的完整,都充满



《南京！南京》真实再现历史

《南京!南京》让人看到了当年残酷的具象的历史。正如主演刘烨所说:“这部电影拍得太写实了,几乎每一天都直面历史,心里像插了一把刀。”以至他“在片场甚至没有跟着军装的日本演员说过一句话,这不是简单地用‘入戏太深’就可以形容的。”这部用4年时间拍出的影片,真实再现了侵略者灭绝人性的残暴,更以冷静的笔触描写了无助的被侵略者的不屈和反抗:军人站立着迎接屠杀,舞女为同胞牺牲自己的肉体,懦弱

者用性命交换非亲非故的人……它让人真真切切明白了:什么是日本鬼子,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家国,什么是亡国奴。它让人反思,让人警醒,让人奋起。

重庆市江北区 胡杨

《南京！南京》让人失望

报载,陆川对媒体表示,以前我们也有不少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但无一例外都是只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述这场战争,结果没有任何一部走出过国门、影响世界。因为人家觉得你太主观。因此他的《南京!南京》换了一个角度,以日本兵角川的视角和他的自我救赎,来讲述那段沉痛的历史。面对中国人惨遭兽性大发的侵略者的肆意杀戮,影片却不惜大量笔墨刻画侵略者角川的善良,展示日本慰安妇的凄婉,甚至渲染日军祭祀的庄重。一段让一个民族铭心刻骨的历史,在影片中却多多少少成了一首人性被战争扭曲的挽歌。侵略与被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矛盾,激发了一个民族8年的浴血抗战。而影片里它却被“升华”或“深刻”为了“人性与非人性的矛盾。多么的“国际化”,多么的“主观”。那是一段夺去了30万人的生命,而杀人者至今不肯正视的历史。对于它的彻底认知,不可能靠人性本善、人性大同,或者共同反战这种超民族、超国家的意识来廓清抑或弥合。

我非常尊重陆川和他的创作团队为这部影片付出的4年的艰辛努力,但它的“独特”视角和所谓人性的笔触,大大伤害了影片的主旨。

北京市崇文区 杨雨

烦人的电视购物广告

每到深夜,一些直辖市和省级上星电视台,便不停地播放电视购物广告。这些广告制作粗劣,画面单调,主持人张牙舞爪,声嘶力竭,神情夸张,言辞过火,一声声叫卖不绝于耳,毫无美感。并且翻来覆去,一播就20分钟,半个多小时,真让人心烦。不断有媒体曝光,这样的电视购物多是欺骗消费者的陷阱,不知道电视台是如何把关的。在我国,电视台不光是营销媒介,还负有宣传教育民众,引导社会风气的职责。总是播放这样的购物广告,降低了电视台的品位,也影响了作为媒体的声誉。

北京市朝阳区 陈立何

《看台人语》自开办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积极参与。前期因版面调整,该栏目停刊了一段时间。今应读者要求,恢复该栏目。希望继续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

来稿请寄:北京人民日报文艺部评论组,邮编:100733。电子信箱:2009ktry@163.com。 —编者